

对戊戌妇女运动局限的历史审视

韩 廉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关键词:社会性别分析;性别盲视;历史分析;历史合理性

摘 要:分析妇女运动的局限也应从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入手,同时结合具体的历史考察。戊戌妇女运动的局限是存在较严重的性别盲视,但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审视,其局限在当时无可避免,并主要起了积极作用,故又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2)01-0041-06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1898

HAN Lian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gender analysis; gender blindness; historical analysi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bstract: Viewed from the new angle of social gender analysis, the main limi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reform 1898 lay in the movement's serious gender blindness; but, view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its limitation, relatively speaking, was rational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t the time.

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开端,戊戌妇女运动首次触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其开山之功,历久而弥新。但因为是落地伊始,其局限便难免严重,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妇女研究要重视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此,以往学术界只是论述其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反帝反封建时所存在的阶级局限,却无专文采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去审视其作为一场性别革命是否存在性别盲点。由于妇女解放本质上是对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文化的革命,因此研究妇女运动,做社会性别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但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时要注意,虽然它是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理论成果,对于各国妇女运动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但它毕竟是仅从性别的视角和以现代的、一般的标准来审视妇女运动,没有考虑其它视角和各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评议妇女运动的局限,除了特别注重

社会性别分析之外,还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诸种历史条件与运动的纠结,视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笔者具体考察戊戌妇女运动性别盲视有六个方面:

手段第一,目的其次

妇女运动应以使妇女真正受益做为动机和目的,而不应把妇女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虽然戊戌时期维新派掀起以“反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的理性认识和对女性的怜悯,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争取妇女的利益,而是为了发动妇女的力量以强国保种和相夫教子,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妇女主要是手段,其次才是目的。

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曾有精辟的分析:“说者谓中国种类之弱,由于缠足之不改;民气

作者简介:韩廉(1953-),女,原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

之愚,由于女学之不讲。缠足不革,故母体衰而种不强;女学不讲,故母教失而民不智。揆厥本原既愚且弱,以故人材不昌,国势日蹙,举世汶汶,莫知其故。于是一二有志之士,戚然深忧,毅然自任,先后创设不缠足会,开设女学堂,为支那数千年创举,开拓风气,为天下先,洵可谓当务之急、非常之举矣。^①

当时妇女运动参与者和同情者的解放妇女话语也无不将妇女描述为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重要载体:“欲强国,必由女学。”^②“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③1898年7月康有为在向光绪帝上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强调放足可使“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④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女学》中则淋漓尽致地论证了兴女学对强国保种和相夫教子的四大益处:一可以富民强国。二可以相夫睦家。三可以提高母亲的素质,有利于儿童的早期教育。四可以益胎教而优生。^⑤

妇女无疑负有强国保种和相夫教子的责任,但男性也应负有相同的义务,家和国的兴旺是两性共同的责任,不可仅责于女性。而且强国保种和相夫教子不是妇女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之一。她们的目的应是使两性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戊戌妇女运动主要被视为手段,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缘由,即它不是本国内部妇女要求解放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维新派为了壮大反帝的力量,在掀起民族民主革命(维新运动)的同时,将其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启动的,这使得戊戌妇女运动很自然地主要被视为强国保种即反帝救亡的手段,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在一段时期内也是必要的。而且即使是被作为反帝救亡的手段,当时对妇女

仍是利大于弊。首先,它在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歧视妇女的情况下,强烈地凸显了她们对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重大价值。以前妇女被视为“天下之蠹”,现在可成为强国保种的“权舆”和“大原”。开发中国妇女这一拥有巨大潜力但长期被忽视的人类资源,第一次被郑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维新派主要是将妇女运动视为手段,也主要是从家庭和再生产角色角度来强调妇女的作用,但毕竟争取到了社会各方面对妇女作用的一定承认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广泛关注。作为手段的承认和关注也比熟视无睹为好。其次,戊戌妇女运动的手段化还使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即民族民主革命结盟,成为同根生,得到国家即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减少了阻力,加快了进程。1898年8月,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使得反缠足从此名正言顺。此后部分地方大员也闻风而动:两江总督张之洞,曾为上海不缠足总会作“不缠足会叙”以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任徐仁铸亲任湖南不缠足会董事,按察使黄遵宪则发布了《湖南署臬司黄劝谕幼女不缠足示》;两江总督、前南洋大臣刘坤一对经善元等禀请支持创办女学堂给予批示赞许,并批准女学堂利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主流社会的认同使妇女运动由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化成合法的政府行为,进入了国家话语,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一开始就颇具规模和深得人心,避免了西方女权运动孤军奋战的困境。

代庖而非赋权

妇女运动应视妇女为发展的主人并赋权于她们,在制订和实施纲领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对男女两性将产生的不同影响,征询妇女的意见,并让她们参与整个决策过程。但戊戌妇女运动的男性领导者没有将妇女作为运动的主人和中

①论说[N].中外日报,1899-08-21.

②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③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N].湘报,1898-09-10.

④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A].康有为政论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心,了解其真正需要并赋权于她们,而是习惯地视其为解放运动的被动受益者,视自己为拯救者而事事代庖,导致了运动的价值取向和纲领政策的男性化。

这集中体现在维新派男性决定将“反缠足”、“兴女学”作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一事上。当然这些都是对妇女有利的,极大地促进了其肢体和思想的解放。但我们要看到,男性领导者选择这些而不是其它作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它们与强种保国和相夫教子直接相关,而不是出于妇女最迫切的需要。如果说强种保国在当时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是全国人民包括妇女的共同利益,而“相夫教子”观则以传统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妇女的传统再生产角色、家庭角色,主张通过男子(丈夫和儿子)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来衡量和体现女子(妻与母)的作用和价值,是典型的男性本位妇女观。实际上,当时妇女最迫切需要解除的痛苦,与男性提出的不尽一致。除了缠足是与男性同仇敌忾之外,她们对封建包办婚姻就比失学更感痛苦,要求解脱的愿望也远比求学强烈:“中国婚姻一事,最为郑重,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制固属谨严,然因此而贻害亦正无穷。”往往造成“凤鸦错配,抱恨终身;伉俪情乖,动多反目”^⑥的悲剧。妇女的处境尤为悲惨:“以自有之身,待人主婚,为人略卖,好恶不遂其志,生死悉听之人。”^⑦而且,当时先进女性关于妇女解放的要求,也大大超出了维新派男性的设定。她们除了要求放足和接受教育这些眼前的社会性别需求外,还初步提出了两项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女子参政及婚姻自主,这是对传统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关系具有颠覆性威胁的要求。卢翠在《女子爱国说》中就大胆要求“如西国设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⑧、“公举

十二人,为女学部大臣,分任各省”^⑨、“荐拔高等女学生及闺媛,入贵妇院理事”。^⑩她们对西方的婚姻自由也心往神驰:“男女年至二十一岁,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是以男女择偶,无烦月老,如或两情契合,遂尔永结同心。”观其并肩共乘,携手同行,百年偕老,相敬如宾,亦差胜薄情怨偶。”^⑪其实维新派男性对封建包办婚姻也深恶痛绝,但因为它与强种保国无直接厉害冲突,未被他们采纳为运动的主要内容。对于女子参政这一敏感问题,康、梁、谭等更是绝口不提。最终男性领导者只选择了“反缠足”、“兴女学”这些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其男性价值取向,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戊戌时期仅有少量的先进女性有解放的要求,广大妇女尚未普遍觉悟,还未形成要求解放的主体意识,还不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正如潘道芳女士所描述的:“中国之妇,只知教女缠足,余外不过仅及刺绣女红。窃其耳,纤其足,日处深闺暗室之中,惨受刖刑,跛之毒,一物不可见,一步不可行,本国之沿革不知,本乡之南北不辨,尚望其博古今通天人穷五洲著论说为国家成人才哉?”^⑫在这种形势下,由较有觉悟和能力的先进男性来发起和领导妇女运动,是必要的,舍此无其它良法。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不必苛求最优方案,而是因时因地选择较优方案更实际。即使是男性当领导,按照男性的观念来解放妇女,也比无所作为、束手待毙要优越。戊戌妇女运动就使中国妇女解放的启动提前了十几年,一代妇女从此免罹缠足、失学之苦,先进男性对此功不可没。妇女运动早一天发动,妇女们便早一天受益,不必机械地等到妇女充分觉醒,条件完全成熟的某一天再开始标准的运动,也不必非要女性始作俑。条件成熟到什么程度,就先干到什么程

⑥ 贵族联姻·按[J].女学报,1898(5),8,27.

⑦ 王春林.男女平等论[J].女学报,1898(5),8,27.

⑧ 卢翠.女子爱国说[J].女学报,1898(5),8,27.

⑨ 贵族联姻·按[J].女学报,1898(5),8,27.

⑩ 潘道芳.女士潘道芳论中国宜创设女义学[A].中国女学集议初编[C].

度,这才是灵活、积极的思维方式。

满足实用性而非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

妇女运动应充分、全面考虑妇女的社会性别利益,包括“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或称“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或称“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前者是在现存社会性别分工中两性角色所产生的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后者则以改变现有社会性别不平等状态为目标。妇女发展要从战略的性别利益上进行考虑,不可仅局限于妇女眼前的需要。^①

戊戌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缠足”、“兴女学”,这些显然属于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并未根本触动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而是使两性继续完成现有角色要求,所以其实现虽然对妇女的肢体和思想解放大有裨益,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也同样有利。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都认为,放足是为了使妇女更好地相夫教子、和家进种。即是说,其主要是有利于巩固传统的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格局。如前所叙,康有为就提出,放足使“中国种,渐可致强。”^②提倡女子教育最力的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一开篇,就高度地概括了“兴女学”对巩固传统性别关系的作用:“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③当时先进女性的认识也如出一辙,《女学报》主笔刘纫兰女士就提出,妇女受教育有利于兴家、和家、相夫、教子和自养:“西人女子各精一学,故能相其夫以成事业。中国女子,柔弱巽懦,每被欺凌。有女学则知识日广,慧智日生。日有健妇持门,亦胜丈夫之盛。利一。古语云:‘恶妇破家’,……父子不睦,兄弟不和,皆由妇人。有女学以明其理,自无长舌厉阶之患矣。利二。……自女学失传,而相夫之贤,遂无闻于世。女学一立,贤哲自出,不惟有益于妇女,并可有益于其夫。利三。太任胎教,孟母三迁,陶士行、欧阳文忠诸人,皆以贤母成

名。近来女子,则纵子者多,教子者少。有学以挽之,有子能教,人才日出矣。利四。广识群理,兼收众艺,即有他故,不致冻馁。利五。”^④

可见“反缠足”、“兴女学”还是以传统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虽然运动参与者也希望妇女受了教育可以求职自养和为国效力,承担起新的生产劳动者角色,但主要还是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妇女的传统再生产角色、家庭角色,仍局限于妇女的眼前需要。

这方面也同样情有可原: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任何地方的妇女运动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和提出妇女的最高利益,直切主题。一般都是从妇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做起,然后随实践的深入,再向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转化。满足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虽不能根本改善妇女的地位,却可以救其燃眉之急。戊戌时期反缠足、兴女学,使妇女开始摆脱足小为美的封建陋俗和“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旧观念的压迫,获得了“全体”(身体完整)和受教育等最基本的权利,解除了其最大痛苦中的两种,这是符合当时妇女的愿望和利益的。

至于女性提出的女子参政和婚姻自主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未被采纳,除了领导者的男性价值取向之外,条件不成熟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守旧势力太强大,就连光绪皇帝已明令支持社会舆论呼声极高的放缠足,他们仍然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如果运动公开标榜婚姻自主,危及三纲;女子参政,“牝鸡司晨”,其反应则可想而知。为了减少阻力,循序渐进是明智的。

忽略家务劳动的价值和妇女已是生产者的事实

在传统文化中,妇女一直被认为是单纯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这是因为评价认知能力和智力的工具包含性别歧视。女性社会学认为就业应定义为职业性的工作或劳动,应确认全职的家务劳动在社会劳动中的地位,对家务劳动

①李秋芳主编,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五十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②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③刘纫兰,劝兴女学启[J].女学报,1898(5),8,27.

价值进行计算和衡量。在社会还未对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计酬,家务劳动也未社会化时,经济不发达国的家庭,仅靠一个家庭成员参加社会工作的收入不足以养家,仅要求女性承担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又太累,故男女都要承担双重角色比较现实。所以妇女运动在主张妇女要参加生产领域,承担双重角色时,首先要认识到其已经承担了家务劳动,而且全职的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一样有价值,故妇女不是单纯的消费者,早已是生产者。其次要充分考虑到妇女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再生产劳动者的多种角色,合理安排其工作量,并提倡男性分担家务劳动,以免除其多重压力。

而戊戌妇女运动仍然视妇女为单纯的消费者,未脱歧视女性家务劳动的男性中心窠臼:他们只注重生产领域,忽略了再生产领域;只看到妇女没有参加社会生产,没有意识到妇女已经承担了再生产劳动的重负,实际上已经在对社会做贡献,只是传统的社会性别机制对其参与及贡献不予承认,使其成为无偿劳动而非价值化了。而这正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如梁启超就认为妇女未受教育,不能求职自养,是坐食的分利之人,从而拖累男子和导致国家贫弱:“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⑭他要求妇女接受教育,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不仅使自己可执业以自立,更重要的是可使占人口半数的人力资源得到开发,社会生产总量成倍增长:“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若此者,舍学未由也。”^⑮其他运动参与者也大都

持这种观点。女学堂主笔裘毓芳就承认女子“为天下之蠹”,认为:“开女子谋生之学,即可减男子分利之忧,而即为国家生利之助。”她呼吁兴女学以助女子成为新的生产劳动者:“尚廿二行省,闻风兴起,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将中才者,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而智慧者且致力于格致、制造以为国家用,化二百兆蠢瞽而聪明之,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国之道。”^⑯

戊戌妇女运动单纯强调妇女要参加生产领域及对国家民族的富强作贡献,而忽略其已经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又未提倡男性与其分担,这就必然会使妇女在承担新的生产劳动者角色的时候,仍单独承担这时本应由两性分担的家务劳动,从而加重妇女的负担,使其双重角色紧张,不能可持续发展。这一点以后成了制约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发展的瓶颈,戊戌时期已初露端倪。

但是我们要看到,提出女性已担负再生产劳动,应该付酬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世界各国早期妇女运动均未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前人。而且戊戌时期民穷国弱,民族危机严重,维新派提倡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可使占人口半数的人类资源得到开发,有利于富民强国。此外,运动大力鼓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对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作用,使得社会从此注意开发妇女的经济潜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也有利于女性取得经济独立,逐步摆脱从属地位。

忽视了男性的实质性合作和参与

社会性别关系是女性与男性共同的社会关系,它的改变需要两性的共同努力,而且男性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其改变现状的责任和能量显然都应该大于女性,没有男性实质性的合作及参与,要有效地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是不可能的。应当承认,戊戌时期的先进男性对妇女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都是

⑭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⑮梁启超.论女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⑯裘毓芳.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N].女学报,1898,(7),8,27.

积极参与及支持的,如前所叙;“反缠足”、“兴女学”运动,就主要是由男子倡导和组织起来的。但当涉及到触动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时,他们便忽视了自己需要作出的调整与改变。如他们反复强调和要求妇女在已经承担再生产角色的同时,再承担新的生产劳动者角色,却对提倡男性分担以前仅由妇女担任的家务劳动,以减轻女性的双重负担,保证男女的共同发展未置一词。而打破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鼓励男女从事传统上对方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提倡男性分担家务劳动,正是改变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西方男女平等思想才传入中国不久,先进男性的思想认识水平不可能达到对妇女解放实质性的合作和参与。而且比起西方早期女权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男性对女性的权利要求一概拒绝,戊戌时期先进男性能对“反缠足”、“兴女学”等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大力支持,已是难能可贵,也是非常重要的。戊戌妇女运动主要是由进步男性倡导和组织起来的,当时各种有关妇女问题的组织,或由男子组成,或有男子赞助。如各地的不缠

足会、《女学报》皆如此。^{①7}正是得益于男性的帮助,戊戌妇女运动才能起势不凡,颇具规模。

男性独揽资源

妇女运动应始终保障妇女对资源的掌握和利用,但戊戌时期各种关于妇女的组织,主要是由进步男性掌握经费、管理权和关系网络等各种资源。如各地的不缠足会,其领导几乎是清一色的先进男性。女学堂也主要由男子管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国女学会书塾”就是由主要创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人代理学堂外董事,负责集款、延聘教习、提调、商定功课、稽查用度等主要管理工作,而沈敦和女士、经元善夫人等12名先进女性只是充任内董事,担任轮流到校稽察功课、协助提调管理校内事务等次要工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是,传统社会一直由男性掌握和配置社会资源,女性始终被排斥在权利机制之外,所以戊戌时期先进男性仍然习惯地包揽一切。而且他们因驾轻就熟,确实比女性更具备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较有效地配置了既有资源,促进了运动的发展。

概而言之,尽管戊戌妇女运动存在性别盲视这一严重局限,但仍瑕不掩瑜。

浦东新区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在上海市妇联、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的指导下,浦东新区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于2001年9月28日成立,是在全市各区县率先成立的妇女发展理论研究机构。中心聘请部分高校和社科院专家担任顾问和特约研究员,旨在借助上海高等学院和社科院的雄厚研究力量,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分析新形势给浦东妇女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思考新世纪浦东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发展的目标与途径,以求在妇女工作的实践中有新思考、新举措、新突破,进一步推动新区妇女与新区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提高浦东妇女发展研究在全国的地位,并为登上世界NGO论坛作理论奠基。

区委姚海副书记在发言中指出:妇女研究要紧紧依靠妇联组织、依靠各高校和社科院专家学者,与浦东开发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连,为妇女发展乃至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服务。他还特别要求,区委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对此都要予以热情支持和参与。

(盛平)

^{①7}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